

学”。其来源，从王夫之“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两语出，以此疏证《孟子》说，圣人之道，根柢在“情欲”二字，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无不遂之欲，则天下治。又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他批评后儒，不知理与情通，不知理与欲同，而以理似法，同于酷吏。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戛戛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梁启超指出：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

梁氏以为，戴的思想革命，其时乃另类，而非主流，且认定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所以，他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其目光所及，还在方法论的皮相，而未见戴氏哲学的内核，不知那内核里还埋伏着救亡运动的因果。正是那因果，在清初，造就了他那样的思想革命者，到晚清，又被他的后学，那个行动起来的革命者，也是从考据学里出来的革命家章太炎所发觉。太炎指出，戴氏处雍正朝，帝好理学，嗜杀，戴氏敢言以理学杀人，乃伤心人作诀别语。新文化运动起，胡适更以哲学的眼光读戴氏，以其推倒程朱理学而视为“打倒孔家店”的先驱。

尤耐人寻味者，为晚清曾国藩，其推崇船山先生更甚于戴氏。船山先生何许人也？清初救亡运动者，与清朝不共戴天也！太炎先生《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云，船山著书，志在救亡，曾氏为清爪牙，何以湘军才克金陵，即以《船山遗书》问世？或曰此为曾氏悔过也，解者曰：洪与曾氏，其志一，而自有缓急，曾缓而洪急，缓成而急败，汉军日兴而虏权日衰，而有武昌起义之缘起矣。故曾氏刻《船山遗书》，乃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对此，太炎先生指出，洪与曾氏，其志不一，其势不两立。

何以知？以曾氏《讨粤匪檄》可知（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卷十四）。以顾氏所言来分，洪为“亡天下”者，而清为“亡国”者。所谓“亡国”者，乃亡人之国，而欲窃取天下也。所谓“亡天下”者，则砸烂旧世界，打破老江山，将天下破罐子破摔也！什么孔孟之道，纲常名教，天理神祇，祖宗菩萨，统统都要打倒，而换一新王。故曾氏救亡，乃立于文化中国而救之，而非以王朝中国救之，先讨“粤匪”而救天下，再以天下进取，顺其自然，和平演变，以湘军收复汉人国权，以湖湘文化立一汉人新国家。太炎先生有见于此，而曰：“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祓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宣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其评价曾氏，又将他放在王朝中国里，削足适履，以诡计论之，曰：“论国藩者，如《公羊》之贤祭仲，汉史之与平勃，

即是国土线，而“利益线”则是国土线的拓展。山县以保护“利益线”的名义，欲实施其欧化的征韩、征满。相比之下，徐氏地缘观念，就没有这样的军国主义特点，他虽然看到了来自日本的隐患，但他还指望中日两国能延续两百年间相安无事的局面，他本人，还有后来的洋务诸公，谁都没有料到堂堂中国竟然被划入日本的“利益线”。

二、天下兴亡系于南洋

顾炎武论中国山川大势，由西北而东南，由东南而西南。

由西北而东南，运河是关键，沟通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由东南而西南，有两条水路，一条是内河，沿长江而上，还有一条是外洋，沿着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下南洋，下西洋。

清军入关，中原沦落，江南残破，顾氏此论，乃伤心人别有怀抱，欲以此海岸线及西南一隅，寄托其反清之志。因其志趣，而言天命在此，此其一也，其二，则所谓“天下大势”。

顾氏以“龙脉”言之，实与中国文化三期发展相吻合。第一期发展在黄河流域，起于西北；第二期发展“由西北而东南”，进入长江流域；第三期发展“由东南而西南”，而至西南沿海。

明清以来移民，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走西口”，于满蒙之地，西域故道，兴边贸；一是“闯关东”，从中原向东三省移民；还有一条是“下南洋”，向海外移民，做外贸。这三条路线，发展出近代中国的基本格局，尤其“下南洋”一线，与我中华民族自近代以至于今日的发展命运攸关。

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对西南之地和东南亚半岛以及南洋诸岛国所言甚多，徐氏《瀛寰志略》，言及南洋滨海诸国及各岛国，亦多引顾氏书，其中，就引用了“顾亭林海外诸番贡市一篇”，以其“颇为详核，故采录之，以资考镜”。而魏源《海国图志》则异趣，其志南洋诸国，只字未引顾氏书。

以魏氏之博学，当知顾氏此书，知而视若无睹，以其公羊学与顾氏朴学相抵牾。

而徐氏《瀛寰志略》，则是接着顾氏朴学往下做的，虽然把“天下”做成了“瀛寰”，把“郡国”做成了“各国”，视野有所不同，但学理还是相通的。徐氏言各国史地，凿凿有据，可他的着眼点一如顾氏，主要还在“兵防”二字。当然，他还把天下观里的舆地，变成近代化的地缘政治。

这一变化，虽由外部危机引起，但亦出自朴学内部的生机。清初之学大，乃

徐氏则以米利坚为“合众国”。

“合众国以为国”，这样的国体，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曾有过，但徐继畲却绕开历代王朝，使人联想起有关先王的传说，那远古的尧舜禹之国。中国传统，以先王时代，为完美的理想国存在，不单以传说存在，还以“致君齐尧舜”的历史目的论而存在。徐氏放眼瀛寰，从“合众国”的国体上，看到了先王。如果我们问他，尧舜之国究竟是怎样的国？他不会像当代历史学家那样，对我们说，那只是个部落联盟，他会指着大洋彼岸，告诉我们：看吧，那就是尧舜之国——“天下为公”的米利坚合众国。

纵观古今，凡为大国者，均由帝国一途，自米利坚兴起，乃知另有“合众国”一路。

历来以共和立国，皆为小国，从城邦共和到民族共和，都迷失在走向帝国的征途上。唯有米利坚，将共和进行到底，以和平方式“合众国成一国”，造就了共和大国。当欧亚大陆还沉浮于战国的漩涡，民族国家还在战雨里漂泊，新大陆却走在先王之道上，走向大同——人类共和的理想。

徐氏谈起过独立战争，他不可能不知道《独立宣言》，米利坚开国，就从《独立宣言》开始，更何况《独立宣言》的政治哲学，同先王之道何其相似！对于“人人生而平等”，有人认为，如此翻译，忽略了以上帝的名义，没有用新教徒的虔诚语气，但它是不是更像中国先王之道的口吻？不是以上帝的名义，而是以人类的名义，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类大同，这样的《独立宣言》便与先王之道相通。

宣言里还有人民主权和人民革命思想，搁在徐氏那里，也都通往先王。先王不是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吗？不是还说过“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吗？

更有甚者，他还将“三代之治”与华盛顿治国相提并论：“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赅赅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所谓“胜、广”，乃陈胜、吴广；而“曹、刘”，则曹操、刘备。此数人，或起于草莽，为起义领袖；或拥兵一方，割据称王。

徐氏将他们一一拿来，与华盛顿相比较，发现华盛顿一人，就兼此数人之长。“提三尺剑”，起兵于民间，“开疆万里”，此乃开国帝王汉高祖刘邦形象，与华氏何其相似，而华氏尤胜之。何也？因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

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赳赳乎三代之遗意”，而开民主之国也！

徐氏将华盛顿放到中国历史上来理解，认为华氏超越了自秦汉以来所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可以直追三代圣王。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史观里，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因为圣王，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可他没将这样的评价奉献给皇上，却无比慷慨地赠予了美国总统。观华氏画像，他一见倾心，叹为“雄毅绝伦”，何也？中国人爱谈“天下为公”，可从周公、孔夫子以来，“天下为公”在中国，还停留于话语上，而华氏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而华氏使它成为国体。

徐氏指出，“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1867年，徐氏老矣，美国公使蒲安臣奉总统之命，将华盛顿画像作为国家礼物送给他，在赠像仪式上，蒲安臣致辞说：画像是总统专门请一位卓越艺术家绘制的，今天，我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对此，徐氏作了答辞，他说：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

徐继畲不是算命先生，可他却预见米利坚的崛起，深知米利坚崛起对于中国的意义。他多么希望两个伟大的国家，在先王之道上联合起来，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稳定东西方两极。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正在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说，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先知。

第五节 “中国—海国”新天下观及其兵法

地缘政治，其来有自，《战国策》纵横捭阖，早已为之。策士们游走各国，活动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围绕秦岭—淮河一线。这一线，是自然地理上的中国南北分界线，也是中华文明的中轴线。孔孟和老庄，都是这一线上的人物，汉唐两帝国，都在这一线上崛起，所谓“逐鹿中原”，就在这一线。这一线，还是政治地理上的王朝生命线，控制这一线，就能建立王朝。

秦汉以后，地缘政治空间往北，越过黄河，进入华北大平原，拓展了“龙门—碣石”一线。这一线是农牧分界线，也是帝国生命线。万里长城就分布在这一线，握住这一线，王朝就能成长为帝国，丢了这一线，王朝就窝在中原难以进展。农牧文明在此融合，一旦成熟，就能生长帝国。

之上，廷议之时，君臣三人竟围在一起，在众人面前哭了起来。许景澄、袁昶乃泣请勿宣战，勿倚赖拳民，皇帝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读史至此，能不感极？可慈禧竟怒喝：“成何体统！”

次日，慈禧命许景澄等通知各国使臣，即日离京，护送出境。联元跪曰：“宣战只对一国，怎能对十余国？”光绪拉了许景澄的手说：“请再商量一下。”慈禧喝道：“皇上放手，不要误事。”

后经荣禄查明，慈禧已知照会造假，可她还是要宣战。总之，老脸已经撕破，她一不做二不休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深宫里，她请出萨满神，用萨满教，将满人都发动起来，一夜之间，几乎都成了义和团。不光满人，还有那些拳民，那些从白莲教来本来“反清灭洋”的拳民，突然也都转变了，转向“扶清灭洋”，都来响应“老佛爷”的政治动员，而成为大阿哥党的党卫军了。

清廷招抚拳民，以团为单位，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团民，又恐各团游散，故设统率义和团大臣，命载勋主持，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庄王府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凡不在注册之列的义和团，都是伪团，照土匪惩办，注册了，即倾公帑赡养之。

大阿哥党终于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几万束红头巾、系红腰带、戴红袖章的红衣人，供其驱使，并派往各衙门把守站岗，把各级政府，都抓在他们手上。

慈禧的政治动员，是萨满化而非体制化的，不靠朝廷靠民心，她要向皇帝展示民心，给那些疆臣那些死不悔改的“保皇派”上一堂“民主”课，让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天听自我民听”。

她要让他们知道，不是她要打倒皇上，而是民意要打倒皇上，废立乃民心所向。顺便，也向洋人展示一下“民主”，让洋人看一看有大清朝特色的“民主”，那种全民跳神的“大民主”。

这样的“民主”，谁说靠不住？这样的“民众”，谁说是乌合之众？当然是皇帝说的。皇帝这样说了，便可见他不懂“民主”，也成不了“民之主”。能为“民之主”者，非老佛爷莫属。

对于慈禧来说，能直接号召民心，便穿透了体制，体制被穿透，也就成了多余。本来政教合一，用政权调动体制，以神权调动民意，可皇帝老实，明于改制，而陋知民意，人性有善恶，民意亦如此，慈禧得其善，而用其恶矣。皇帝改制，还是在制度上考虑，而慈禧则品味民心，把玩民意。

她把神权放在民心上，让民心发出掀天揭地的力量，她要用这力量，去打倒皇上。

可这力量如野兽，搞不好，亦会反噬，吴永《庚子西狩丛谈》^①卷四上说，宣战后，大阿哥党要废立，与慈禧争吵起来，慈禧后来回忆说，那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都同义和团混在一起了，连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载澜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了……

不过，这时她已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那便是荣禄的拜把子兄弟董福祥统领的甘军，戊戌政变时，荣禄调来董军，皇帝说是董卓进京。御前会议上，当慈禧脱口而出“我恃董福祥”时，她对董军有了连荣禄也始料不及的信任，连荣禄都不知道老佛爷究竟用什么手段改造了董军，董军居然与义和团打成一片，以军队支持拳民造反，成了一支“萨满子弟兵”，而慈禧则以此掌握并监控数万拳民。

董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我们先来看董本人的出身，以及义和团的来源。

董父为哥老会一方头领，由白莲教入甘的一支发展而来，董以“反清灭洋”号召教众，投入陕甘回民起义，兵败后，被左宗棠招安，转向“扶清灭洋”。由此可见，其与拳民来路相同，都从白莲教来，转向亦同，都从“反清灭洋”转向“扶清灭洋”，故董本人，即为拳民榜样，有号召的力量。

引起“庚子事变”有三种力量：一是游民，被萨满教发动起来；二是满人，被老佛爷发动起来，跟皇帝拼命；三是董军，从游民起义中来，回游民运动中去，如鱼得水。所以，老佛爷说“我恃董福祥”，而不说“我靠荣禄”，她知道，体制内要靠荣禄，搞群众运动，要靠从群众中来的董福祥。

慈禧不怕破罐子破摔，更不惜摔出个无政府状态，任由大阿哥党一伙去折腾。

运动一开始，还开了几天御前会议，有个朝廷的样子，帝党、后党各持己见。对于拳民，皇帝要剿，而慈禧却说神功可恃，民心可用；对洋人，皇帝要和，而慈禧要战，虽明知归政照会系载漪伪造，也不改其欲战之初衷。此时，打与不打，战与不战，已非军事考量，而是政治上画线。打是爱国主义路线，不打是卖国贼路线，老佛爷喊打，是爱国主义的代表，皇上不打，就是卖国贼的代表。

爱国，还是卖国？用神功一查就知道，皇上原来是“毛子”。大阿哥党要取

^①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西狩丛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代“人民权利”和“自然权利”。

“直”字，从目从十，《说文》曰“正见也”，徐锴注曰“十目所见是直也”，即所谓“共识”。《书·洪范》曰“王道正直”，乃以“王道”为共识，且来源于共识，故“正见”与否，要以“王道”来检验，被“王道”检验过的“直”，方为“正直”。“直”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作为货币的币值，《史记·平准书》曰以白鹿皮“为皮币，直四十万”，引申之，或曰“物价曰直”，“佣作得钱亦曰直”。

严复以为，提示正当性的“rights”字，在西文里“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 right line，直角谓 right angle”，由此可知，“中西申义正同”，都以正当性为“直”。不过，在西方，那是标准，是尺度，而在中国，则是由“十目所视”形成的共识，它集中反映了共同体意识，并以“王道”为共识的最高形式。因此，所谓“共识”，既是王权正当性的依据，同时，又被王权所代表而成为王道。

严氏透过王权，从古汉语里，挖了三年，挖出了个“直”字。于王道之根柢，发现了“天直”、“民直”，以之为本，划分群己权界，并赋予“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以法权形式。

他向梁启超谈他如何发现“直”字，说他偶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就以为“职”有 rights 的意思，可他又担心，译成“职”字，会与 duty 混而生歧义，因为 duty 除了做主，还有责任、义务、纳税等意思。后来，他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见王解《毛诗》“爰得我直”，将“直”解读为“职”，就以“直”字译 rights 了。诗即《硕鼠》，诗人如摩西，号召人民“适彼乐土”。

诗分三段，三段结尾处，诗曰：“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从“乐土”到“乐国”到“乐郊”，从“我所”到“我直”到“永号”，反映了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朴素要求。择“乐土”而安居——“我所”，立“乐国”而自主——“我直”，耕“乐郊”而自给自足——谁不快活？此乃古代之“三民主义”，择“乐土”，聚族而居，为民族主义；立“乐国”，而民主之，为民主主义；耕“乐郊”，而裕民生，为民生主义。诚然，诗人如孙文，皆理想形态也。

《诗》云“我直”，并非作为币值而言的“我的报酬”，而是基于“正见”和“正直”的“我的正当性”。以“我直”为本，其来处为“天直”，行自然法；其去处为“民直”，立万民法。

从“我直”出发，这本来符合他“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说法，但他未以“我直”立言，而是将“我”隐匿，舍“我”言“直”，且以“天”和“民”代

开显，而有孟曰“万物皆备于我”，陆言“吾心即是宇宙”。

《诗》云“我直”，陆言“吾心”，与西人笛卡儿之“我思”，皆以“我”立言，而异于朱子“无我”。“无我”，必“灭人欲”，有“我”，则存天理，也存人欲。明末，刘宗周、王夫之，都这么说过。清代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从孟子那里，找到了打开天理人欲格式的突破口，将理还原于欲，以“灭人欲”为“后儒以理杀人”，尤甚于“酷吏以法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对此，严复应知。但儒家传统中，门槛甚多，除了理欲之辨，还有义利之辨，经由孟子，可以迈过天理人欲的槛，却走不出义利这道槛。然而，不过这一槛，“权利”如何能立得起来？

经由孔孟、程朱一线，我们只能在义利观里兜圈圈，很难迈出走向“权利”的一步。如果回到原典，从五经出发，撇开四书，那时，还没有义利之辨。如上所述，《诗》云“我所”、“我直”，就包含了个人利益，而《易》曰“亨利”，就更以“趋利避害”为宗旨，读《易》者，谁人不知？

严格来说，五经之中除了《春秋》，皆非儒学。孔子仅以仁义裁成诸经，而其本身则不待孔子而成。未有孔子之前它们已在，但非以经而在，而是以史而在，如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

经之所以为经，一要有孔子以仁义取之，二要借助政治权威，由大一统的官方来认定，从春秋到汉代，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儒家经典，不是儒学的产物，相反，儒学倒是原典之树结的果。

孔子“述而不作”者，五经是也，儒之“作”也，自四书始，孔子之于《论语》，乃“述”之者也，录而“作”之者，其门人弟子也。义利之辨，五经所无，有之者，始于四书。四书“罕言利”，而五经多言之，以《易》为代表，“利以合义”，才是五经的主旋律。

因此，超越义利之辨，先要翻过四书的墙，直奔诸子，回到五经去。

“利”，应时而变，儒曰“圣人可权”，可一“权”，“利”就变。“权”为度量衡，故称“权衡”，权衡利弊，权衡利害，凡“权”必与“利”相连，如《商君书·算地》所言“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法家也主张人民应有“权利”，但“权利”于此，是一种生存底线上的生活方式，民“权利”——权衡利害，就“畏法而易苦”，好统治。在这里，“权利”也与法律相联系，但不是以主权方式，而是以奴役方式，人民一“权利”，就被奴役。

第五章

从耕战走向商战的国家利益思想

第一节 商战之茶叶与鸦片

商战思想，由来已久，先秦时期，《管子·轻重篇》已有之。

以货币经济为杠杆，以国家贸易为手段，通过对国家战略资源的调控，来撬动他国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这在齐、楚两国，乃国之常事。楚以货币，齐以盐，如今之石油与美元，皆为商战利器。齐、楚争霸，灭国无数，或以兵战取之，或以商战得之，或两手并用，先以商战弱之，再以兵战取之，《左传》、《国语》、《战国策》里论述过，《管子·轻重篇》则集中反映之。

秦汉大一统后，九州之内无国际，九州以外，概以天下视之，且以天朝临天下，与各国贸易往来，不过赐贡而已。天朝赐之，乃“喻于义”之举，而各国来朝，则“喻于利”也。

尽管国际贸易以“朝贡”为名义，尽管天朝自命为“喻于义”，但还是难免暗用商战羁縻，如汉之丝马贸易、唐宋以来之茶马贸易，都曾牵动过世界经济的大格局。罗马帝国时期，有人说，中国用丝绸吸尽了罗马的金币，故主张以法律禁之。后来，人们对汉代进行考古，遗址里，从未发现过罗马金币。原来，汉人用丝绸换了西域战马，是中亚人用丝绸换取了罗马金币，所以，汉人没拥有罗马金币，却用战马打通了西域。从汉到唐，中亚人于丝绸之路，吃东西方贸易，吃得一个个帝国从此崛起。

在东西方贸易中，天朝不动如山，以静制动，给中亚人和西亚人留下了很大的盈利空间。罗马曾想直通中国，却受阻于西亚和中亚，而终未得逞。唐宋以

来，东西方贸易从内陆转向海外，还是阿拉伯人在中间做了中转。明中叶以后，西方人为了寻找中国，开始了大航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有荷兰人和英国人，接踵而来，这一回，他们不是带着白银奔丝绸、瓷器来，而是奔了茶叶来。

当时，东西方之间主要有两大贸易，一是茶叶贸易，一是鸦片贸易。茶叶贸易的产地在中国，鸦片贸易的产地主要有印度、土耳其等地。这两大贸易都影响了世界历史，茶叶贸易影响了西方历史，鸦片贸易则改变了东方。为什么说茶叶贸易影响了西方历史呢？以英国为例，林则徐对英主战，理由之一就是英夷嗜食牛羊肉，如不喝茶，会消化不良而死，所以，英夷要靠茶叶活命，而茶叶则操之于我，故我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茶叶出口欧洲，先经荷兰人手，后为英国人取代，超过瓷和丝，约占了中国出口货物的90%。其时欧人，以茶为极品，尤其英国人，饮茶而自成一整套茶文化。据说，茶叶是有史以来率先在伦敦登广告的商品，不仅贵族趋之若鹜，中产阶级也跟着大饱口福，就连工人也以茶点为饮食了。放眼世界，从17世纪到18世纪，东西方都“吃茶去”，而中国，则是唯一能出口茶叶之国。

中国茶叶出口，除海路，还有两条陆路。一条是草原之路，从东南沿海往西北去，经由蒙古，通往俄罗斯。这条路，南起福建，由晋商转运，将武夷山茶叶加工成茶砖，水运到汉口，经洛阳，过黄河，越沙漠，驼运至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然后往俄及北欧各国。还有一条是高原之路，乃西南茶马古道，有三条线，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由此三线，通往南亚、中亚、西亚，向西抵达地中海。

东西方茶叶贸易，以海路为主，而海路又以英国为主，因此，茶叶贸易对英国的影响最大，不仅影响了英国本土，还影响了它的殖民地新大陆。徐继畲指出，英据北亚墨利加之地，起初“沿海遍置城邑，榷税以益国用，贸易日益繁盛，以此骤致富强”。后来，英“与佛郎西构兵，连年不解，百方括饷，税额倍加”，便打起了茶叶算盘，本来，“茶叶卖者纳税”，可英立《茶叶税法》，“下令买者亦纳税，米利坚人不能堪”，而英官却无视绅议，“逐议者，督征愈急”。新大陆上的美国人像英国人一样，以饮茶为时尚，但茶叶贸易却被英国人垄断了，这还不够，还要来收税，每磅课税3便士，于是，美国人愤怒了。先以不喝茶的方式抗议，据说，富兰克林曾用胡桃木叶子来代替茶，可效果并不好，后又到英国去，向英国国会申述，结果，还是被国会拒绝了。美国人终于愤怒了，遂“投船中茶叶于海”，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这十个领域，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以此论商战，颇有国民经济总体战的味道。后来，盛极一时的“实业救国”的口号，就是从这种商战思想中产生的。差别在于，商战思想还带有帝王学的背景，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观念向商业领域的延伸，而实业救国，则纯然商人以企业为本位的理想。商人借此摆脱了行商坐贾的传统形态，非以民之末梢而以民之纲要国之枢纽树立起商人的近代形象。

商战，以市场为战场，虽然国家成为商战的主体，但商战亦会超越国家利益，因为市场毕竟大于国家，所谓大，不仅在于市场外部格局的全球化，更由于其内在本质的自由化。郑氏仅以一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是言不及此的。他注意到了贸易全球化，却未知还有自由化，他从来没有想过市场大于国家，可以取代天下。天下空洞化，市场把它充实了，天下模糊化，市场使它清晰了。在市场里，商战取代兵战，商战之士取代耕战之士，很有点“赳赳武夫，王之爪牙”的味道，成为王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纠结而成的洋务战士，以其“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而被重商主义的洋务运动奉为国之利器。

倡导商战，以全球化论之，乃外争国权，由此而兴起民族主义；以自由化言之，乃以商权争民权。因此，“商战”思想，实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思想之滥觞，处于重商主义的发展阶段。

郑以后，商战思想已普及为社会思潮，据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下列一表。^①

序号	人物	提出商战的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1	曾国藩	1862	《曾文正公书札》第17卷
2	李璠	1878	《洋务运动》第一册
3	郑观应	1884—1892	《盛世危言正续编》、《盛世危言后编》
4	盛宣怀	1887	《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卷、《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
5	刘铭传	1889	《洋务运动》
6	经元善	1895	《近代名人手札真迹》
7	谭嗣同	1895	《谭嗣同全集》
8	汪康年	1896	《时务报论说汇编》
9	徐勤	1895—1897	《皇朝经世文新编》

^①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续前表

序号	人物	提出商战的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10	卖孟华	1897	《时务报》
11	江标	1897	《湘学新报》
12	唐才常	1897	《湘学新报》、《觉颠冥斋内言》
13	陈为镒	1897	《湘学新报》
14	李均鼐	1897	《湘学新报》
15	鄢廷焯	1898	《湘学新报》
16	徐儒霏	1898	《湘报类纂》甲集
17	黄熙	1898	《湘报类纂》甲集
18	黄垒	1898	《湘报类纂》丁集
19	王凤文	189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20	杨祖兰	189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21	严复	1900	《原富》
22	袁世凯	1903	《清朝光绪文献通考》
23	浙东市隐	1903	《晚清文学丛钞》
24	张謇	1904	《张謇庵实业文钞》
25	沈敦和	1910	《盛世危言后编》

王尔敏指出，二十五位代表人物中，仅有郑观应、鄢廷焯两人纯为商人，其余，均来自科举制出身的传统士人。由此可见，商战思想，已在传统士人当中引起共鸣，他们以传统来回应。

二、传统重商思想的近代反应

晚清的那两次鸦片战争刺激了商战，对商战的回应产生了重商思想。

然而，思想的来源及其思维方式，都来自中国传统，这是传统的本能反应。

受了外来刺激，他们不约而同地反求诸己，用传统进行回应，并同构之。有人问郑氏曰“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郑氏曰：“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郑氏著作定“凡例”，先要开门见山，道出自己对于孔孟之道的遵从。

以“权术”之于“常经”，“富强”之于“孔孟”，均纳入“器”与“道”中，

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他要首长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为首长撬动中国。首长说，那你就去上海吧！这个支点在上海，就是轮船招商局。唐只会在“轮船”上下功夫，办航运公司，他却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为首长招商引资，搞军事化的金融产业集团，作为首长治国平天下的“户部”。

为助首长建立“亚财政”和“准金库”，盛“提出保险存款及各省存款一百数十万两”，并招商，“做一小小银行”，为首长运作资金，先将“已成之船、电两事办好”，然后“扩充商务”。朱荫贵《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①指出，中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纺织、银行、煤矿、铁政、铁路等新式企业，绝大部分都有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投资在内。有人认为，他投资，是做“空心大老”，玩“无本生涯”，“独揽轮船、电报、铁路、煤矿和纺织诸大政”，以期“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岂止“十六颗”？他投资十九项，总计三百一十二万两，而同期招商局资本总额才四百万两，所投重大项目有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局、湖北铁厂、萍乡煤矿和通商银行等，这些项目，同招商局的本来业务无关。

盛氏转型，符合“首长所有制”，因首长曾言，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则大。唐专意“海运”，能为“尚小”，难为“则大”，而盛氏却能从“大”处下手，将国防的杠杆，放在产业的支点上，用来撬动“国体、商情、财源、兵势”，以造就军事化、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此种能力，是着眼于商办的唐廷枢所不具备的。唐的优势在于以商业模式办企业，而盛氏的强项是能以政治手段搞商业，以权力支配经济，当然运用之妙，还得由首长拿捏。

首长不爱官办，官办事难成，也不爱商办，商办与他何干！那么官商合办呢？很难，不是官家资产流失，就是商家产权被侵犯，一旦办好了，还会被朝廷拿走，办不好，则被朝廷追究，因此，他喜欢官督商办，官不出资，办好了，朝廷拿不走，但可以“官进民退”，转化为首长所有，办不好，则以“官督”追究“商办”。故设局之初，首长就指示，“毋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开办费，则由首长奏请户部借领官款，“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②。借了官款，自然由官来督办，可还清了官款呢？唐廷枢表示“无所适从”，盛氏转达首长指示：公款还清，亦必应官督商办。且致函马建忠曰：“总办仍应大宪酌

① 该文出自朱荫贵：《朱荫贵论招商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② 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269页，1935年刊印。

派。虽公款还清，仍是公局，必须官为扶持。中西情形不同，未便悉仿西法。从前唐、徐屡言不要官问，究不可靠。”^①“大宪”是什么？是首长，招商局最高首长，就是直隶总督李鸿章。

唐的总办身份，乃首长札委，本兼有“官督”和“商办”两种职能，可他“悉仿西法”，故“商办”有余，而“官督”不足。本来，他在经营上搞他那一套“西体中用，商体官用”也就罢了，首长对此亦颇能理解，本不予追究，可他竟然搞到所有制上来了，所有制的水太深，首长在此“潜龙勿用”，你非要明确了股东所有制，这不是要颠覆首长，将革命革到首长的头上来了吗？你把股东所有制提出来了，难道首长能把首长所有制提出来吗？真不识时务！你有股东推举，难道就不再需要首长任命了？别忘了，企业创始人是首长，饮水要思源，做人不忘本，招商局不仅要“以官为体，以商为用”——“官督”，更要“以官为本，以商为末”——“官本”，经营不妨“商办”，所有制必须以“官督”立“官本”。商人有商人的抱负，商人的抱负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首长有首长的抱负，首长的抱负是治国平天下。

第三节 商战之市场与官场

一、“以夷制夷”：赔款与借款

李鸿章喜欢“以夷制夷”，制来制去，结果呢？还是被夷所制。

你若去问他，他会告诉你，“制”是智力游戏，胜负还要靠实力。

原来，他是陪人玩游戏的，而且，还是玩游戏的高手，所以，老外喜欢跟他玩，看他长袖善舞，以弱国而为天朝舞，看他纵横捭阖，如戏台上跑龙套，调兵遣将那一声吆喝，好！

老外都知道，陪他玩，不光看好戏，还有机会从他那里弄来白花花的银子。

老外要顺差，鸦片早已没戏，顺差的源头，就在他那里，他要买军火，发展兵工业，还要以工业为基础重建国民经济体系，办成“军事—工业复合体”，谁知他要花多少银子？

先帮他建战争机器，然后，带他到战争俱乐部里，让他玩“以夷制夷”的游戏，看上去，那战争机器，是个庞然大物，可实际上他总是缺了点争胜负的实

^①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一册，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召左进京，委以军事，左从此不再过问商战之事。李亦回头，继续招商引资。赖此狙击，外商丝厂转而寻求与中方合资，国家利权勉强得以维持，而不至于完全丧失。可胡还在狙击，终于被朝廷当作肉中刺，而欲拔之。朝廷变脸了，便在英雄头上浇了一盆“投机”的脏水，狙击外资入侵，也就变成妨碍“招商引资”了。

商战至1882年，胡雪岩还在收购生丝，囤积原材料，而李鸿章则开始收购外商丝厂，来摘商战的桃子了。一心想摆脱外商控制的胡雪岩，没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鸿章的手里，被李主宰。商战至此，性质已变，从一致对外，转向胡与李内战，李与帝国主义合作，像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来灭胡了。

1883年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机的苗头，查《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一书可知，该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款项银五十六万两，突然倒闭，累及钱庄四十家。上海各钱庄鉴于金嘉记源号丝栈倒闭，遂次第收回向各业放款，而各业因周转不灵歇业者相继而起，不过半月时间，歇业之商号二十余家，到欠款项总数银一百五十六万两。按照中国传统过阴历年的风俗，可说是年关难过。上海钱庄，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日，一开市，南市钱庄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则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异象，胡似乎尚未注意到，据夏东元撰《盛宣怀年谱长编》^①，是年，胡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丝就有一万五千包，压了资金一百二十五万英镑，以当时一英镑兑库平银四两左右换算，胡投了白银约五百万两，可他还不罢手。这年六月，误传意大利生丝歉收，他接着收购生丝，推动丝价节节高升，自家钱庄几无头寸可调了，便向外资银行拆借，虽拆东补西，但屹立不倒，声势依然。可有两个没想到予他致命一击：一没想到意大利生丝，非但没歉收，反而大丰收；二没想到盛宣怀捅了他一刀。

应该说，胡与李鸿章一样，都是出色的糊裱匠，纸糊的功夫，堪称当今有二，举世无双。胡以纸糊的金融，糊弄出个金融纸老虎的吓人模样，就如同李鸿章搞纸老虎的国防，可惜他们都被人捅破了。胡那一身首富的行头，被盛宣怀看准了缝隙，一捅就破了，而李鸿章那一副看上去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化的北洋戎装，也被日本人摸清了穴道，一击而溃了。不过，先后相去，有了十来年的时间。

而眼下，就要被捅破的是胡雪岩，糊裱匠捅糊裱匠，知道破绽在什么地方。

①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第二节 走出王权走向国权的国防思想

曾氏之志，未可自道，托《船山遗书》以明之。若以船山遗志为曾氏之志，则可于《船山遗书》见曾氏抱负。船山先生于国破家亡时，以文化中国寄托其救亡之志，曾氏于收复汉人国权时，亦以文化中国为寄托矣。

曾氏贡献于晚清者，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起死回生。此外，曾氏对于中国近代化还另有贡献。除了始作洋务，他还是汉人收复国权运动的始作者，两百年来民族救亡运动，终于在体制内有了进展。

这条路线，是从书院那一路来的，虽说还是靠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曾氏本人，走的还是“内圣外王”的路线，他自己的抱负，还是“六经责我开生面”。船山先生“开生面”，是开在内圣里，结了哲学的果，而曾氏“开生面”，则开在“外王”里，结了救亡运动的果，不仅讨“粤匪”以救天下，还立湘军以收复国权。朝廷分化湘军，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已入曾氏彀中，使湘军三分天下矣。

如以曾氏一军，其势还难以发展，分为曾、左、李三军，看似相制，实则相拱，遂使湘军集团由东南而中原，而西北，遍及天下。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汉人掌兵，曾氏实为始作者。

须知王朝体制，自有一条定理，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曾氏得之，以为心法，传之于湖湘文化。从湘军到淮军，到北洋新军，从曾氏到李鸿章，到袁世凯，这是一条用枪杆子贯穿的路线，就他们几位，用枪杆子转移了清政权。我们老说曾氏如何“内圣外王”，拿他同王阳明比，灭心中贼，灭山中贼。可他比王阳明还高明，因为他多了一个使命。我们从《讨粤匪檄》中可以看到，讨“粤匪”，他不以清王朝为号召，而以文化中国为号召，克复金陵，万事方兴，而曾氏兄弟却急于刻印《船山遗书》，期以船山先生提撕湖湘文化，再以湖湘文化振兴文化中国，且欲迫使清朝就范于文化中国，耿耿此心，如日月之明也。

同治中兴，曾氏所欲也，然其理想，在于文化中国，故其办洋务以复兴王朝，兴西学以发展中国也。或如孟子所言，鱼吾所欲也，熊掌吾所欲也，其欲兼得清王朝与文化中国。如非兼得，则舍鱼而取熊掌，舍清王朝而取文化中国也。曾氏安身于清王朝，所谓“生”也；立命于文化中国，所谓“义”也。舍生而取义，非独孟子，曾氏亦然。曾氏不欲王权，故无“挟天子”之意；不图王朝，故

无革命之举。其志在文化中国，故欲以湖湘文化开出中国近代化，以近代化开出文化中国新格局矣。

曾氏民间起兵，练成体制外新军。当时，朝廷最害怕太平军，而最担心的，便是这支体制外的新军。朝廷信任的，还是体制内之军，尽管无能，还得依靠，唯其无能，所以放心。

然，曾氏佳处不在用兵，而在治军，当时只有他知道，对付太平军，要用“圣人子弟兵”。如何练成“圣人子弟兵”？曾氏以理学修身，以讲学治军，以师生为军系，以书生领山农，兵营里，都是子弟与乡亲，耕读合一，耕战合一，书院开在兵营里，战士都唱《爱民歌》，都做“圣人子弟兵”。

唯有“圣人子弟兵”才能打败太平军，唯有以文化中国才能战胜“拜上帝会”。面对“拜上帝会”，他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国人，起来救亡，不是救王朝，而是救天下，救自三代以来历尽千年维系天理人伦而被“粤匪”摧毁之纲常名教，救无数以仁人之心义士之魂化而为之且由人民普遍信仰却被“粤匪”打翻在地的千秋神祇，还田于农还货于商还父母于人伦还诗书于江山还孔孟于中国……如此救世军，当然是“圣人子弟兵”！“听啊听，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从头听到尾，军士与民共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当年，左宗棠以“鼎之轻重，似可问也”，托胡林翼转致曾氏，曾氏改一字，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答复。胡一看，就说，你们“一似一未”，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彭玉麟亦以密函呈曾氏，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氏阅而变色，忙说：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祺祥政变后，肃顺门下湖湘名士王闿运投奔曾氏，劝曾氏自立，曾氏不语，低头书写“妄”、“谬”二字，王遂离去。或曰，湘军陷天京，国荃曾萌异志，曾氏劝之曰“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其后人亦言“李秀成劝文正公称帝，文正公不敢”，孟森为北大影印曾氏刻本《李秀成自供》作序，还提到了这个传说。曾氏作书屋“思云馆”，湘俗构新屋必诵上梁文，世所传《上梁文》，乃由工匠以湘乡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貌似俚言，实为民意，船山以帝王学开出湖湘帝王气，从此流行矣。有人说，曾氏不敢做皇帝，是因为没把握，但是，如果他有野心呢？敢不敢称帝，要问有没有野心，而不要问有没有把握。因为，除了生在帝王家，生来就要做皇帝，谁敢说自己有把握做皇帝？无论曾氏有没有野心，朝廷都要把他作为假想敌，谁让他拥有军队，且具备了颠覆朝廷的能力？这不光出于君主专制的制度性考虑，更出于王权主义的本能性恐惧。曾氏裁军，可以表白自